



闲话

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作品具有许多超越时代的因素,这使得我们今天读鲁迅的作品,总感觉到他仍然活在现实生活中。

鲁迅的文学创作有很强的文学性,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并在世界各国传播。但同样,他的深刻性,也还有很多没有被真正理解,甚至也遭到了很多误解。

时下,中学校园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造成学生怕周树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学生学鲁迅作品多半是为了考试,枯燥乏味;教师在讲解鲁迅的作品过程中没有从应试的要求中走出,支离破碎地讲解很难让学生完整地理解文章。学生为什么会怕读鲁迅的文章,说到底与教师们的教学方法有关。《孔乙己》《社戏》等课文简单地被演绎成“新旧社会制度的对比”。这种生硬的解读,使许多学生难以理解鲁迅作品的真实内涵,读不懂也就自然。

鲁迅作品是中小学语文教学中不可回避的内容,那么如何让学生读懂鲁迅,首先要把鲁迅置于现代中国去理解,理解他作品思想的深刻性、象征性。在我看来,鲁迅之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托尔斯泰之于俄国、泰戈尔之于印度……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

时代呼唤鲁迅精神

□ 舒绍辉

编者按: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暨“2016鲁迅文化论坛”于9月23日在北京隆重开幕,本次论坛共举行3天,着重提出如下共识:1、对于鲁迅的文化贡献应该按照文化的“保存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来定位,他并非一个简单的批判者或歌颂者。2、强调“鲁普”,要让鲁迅走向大众,走向社会,走向企业,走向社区,走向国际。3、要开拓新路,吸收新的力量和新的思维,培养鲁迅研究的新生代,使鲁迅精神传承有序,后继有人。



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

譬如鲁迅作品中的人性启蒙思想,以《药》《祝福》《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为例,鲁迅对“铁屋子”的呐喊,唤醒沉睡、麻木的国民,对当今的人们仍然有警示作用。

当下,物质文明取得了空前进步,但各种困难和矛盾依然并存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从精神文明层面而言,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

还尚待提高,对人事人情的那份冷漠似乎又并未走出鲁迅作品所批判的那个岁月。

从著名学者钱理群的《鲁迅九讲》和刘发建的《亲近鲁迅:落地麦儿童语文学课堂》两本书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只要社会还存在瑕疵,我们就需要鲁迅的声音;只要人类存在精神的虚无和彷徨,我们更需要鲁迅的精神慰藉。

鲁迅作品中饱含着浓浓的“立人思想”,著名学者将它概括为两个方面,即为“人之子”和做“人之父”。他的立人思想在当下,甚至未来都值得借鉴。

从人性的角度挖掘鲁迅作品的人文价值,完全可以使我们亲近鲁迅。比如《少年闰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表现的童真、童趣,《社戏》中让我们心动的也是少年纯真的童心和淳朴的乡情。《藤野先生》主要还是对关爱过自己的老师的赞颂和回忆,就如《阿长与〈山海经〉》对淳朴的长妈妈的赞誉一样,是对滋养过自己情感的人的怀念和感激。

鲁迅有些文章虽然晦涩难懂,但他在文章里彰显的精、气、神已经足够我们领悟。触摸鲁迅,伴随我们这个民族走得永远。“一个民族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这个世界上生活。”1927年,鲁迅在香港演讲《无声的中国》时指出。

钱理群在《鲁迅九讲》中指出,“能否容忍鲁迅,是对当代以及未来中国文化发展宽容度、健康度的一个检验。”我认为,在我们承认鲁迅作品价值的前提下,如何用鲜活的、自由的方式去解读和触摸鲁迅。鲁迅作品不再沦为标准化考试中只有惟一答案的阅读材料,应该是语文教学和考核改革必须思考的课题。

咬文嚼字

细说“十大语文差错”⑤

「启事」和「启事」的三点区别

□ 苏丽

启示:启发使领。启事:陈述事情,多用于下对上;陈述事情的奏章,函件;公开声明某事的文字,多登在报刊上或贴在墙壁上。

早在20多年前,吕叔湘先生写过一篇《错字小议》,其中谈到“启事”“启示”容易误用。20多年过去了,这一差错非但没有绝迹,相反还有蔓延之势。某品牌刊物刊出了“征稿启事”;某知名企业,刊出了“招聘启事”。网上搜索一下,该用“启事”而误用“启示”的,竟多达数百万条。“启事”和“启示”至少有3点区别:

一、表现形态不同。“启事”是一种公告性的应用文体,是为了说明某事而在公众中传播信息,一般采用登报或张贴的方式,其形态是显性的;而“启示”则是启发提示,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启迪思想或激活思维,其形态是隐性的。

二、语素意义不同。“事”“示”有别,不必细说;同一个“启”字,说的也不是一回事。“启事”用的是“启”的陈述义,即开口说话,它和“启禀”“启奏”的“启”同出一辙;而“启示”用的是“启”的开导义,即“启蒙运动”的“启”。前者是向人诉说,是单向的;后者既可启示他人,也可自己受到启发,是双向的。

三、语法功能不同。“启事”是名词,不能带宾语;“启示”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它可以带宾语的。

评析

围绕初中生留学问题展开叙事的电视剧《小别离》热播,用富有生活温度和情感力度的家庭故事,呼应现实诉求、直击观众心灵,以良好的口碑和较高的收视率,宣告现实题材创作的倾情回归。

《小别离》:牵动社会敏感神经

□ 杨洪涛

中国人固有的传统教育观念和西方教育观念有着诸多差异。出国留学是否能够成为学历教育的良方?出国是否真的能够给学生带来更为光明的未来?这是家长、学生乃至社会必须审慎面对的问题。

《小别离》不回避问题,不掩饰矛盾,不主观臆断,而是将青春期少年的成长以及教育观念、教育体制等更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仔细斟酌考量。创作者分别以成绩优异、中等和一般的三个少年角色来刻画不同学习程度的初中生,又选取了再婚家庭、和睦家庭和问题家庭来表现不同的家庭氛围,通过这种颇具典型意义的选材为观众提供观照自身的镜子,也为观众提供了关于中学生教育的多样思路。该剧把客观、典型、真实的现实主义气质贯穿始终。透过生活细节的捕捉,人物心理的描摹和矛盾冲突的制造,把三个家庭面对留学问题时的种种情态逐一呈现给观众。

大,以及血缘的神奇和凝聚力,提醒观众珍惜身边的亲人和拥有的一切。在讲述代际关系时,创作者没有做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机械地站在某一立场去指责另一方,而是站在善意的角度、用理解的态度,真诚沟通父母和孩子的关系。

剧中许多涉及代际冲突的桥段,让观众有似曾相识的代入感,似乎每个人都能在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反观自省,倍加珍惜家庭。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别离》跳脱了家庭生活题材创作的局促范围,向着更为广阔的人间大爱和更为深远的心灵空间拓展。

长期以来,着眼于中学生成长的作品时常缺席。《小别离》从不同阶层、不同视角全方位观照中学生留学问题,戳中生活痛点,呼应社会关切。在玄幻剧、偶像剧充斥荧屏的当下,《小别离》用足够的魅力把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从漫天飞舞的神仙侠客和相貌雷同的小鲜肉身边解脱出来,回归现实生活,关注自我成长,为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优秀范本。

《小别离》用出国留学的短暂离别,讲述别离与相守的关系,亲情的可贵和伟大,以及血缘的神奇和凝聚力,提醒观众珍惜身边的亲人和拥有的一切。

格言新说

世有千里马,然后有伯乐

□ 彭荆风

选贤与能一向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历代以来,人们都为贤能的被发现或被埋没而为之喜,为之忧。春秋时代伯乐识千里马于槽枥,更是引发了唐代大作家韩愈“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深沉感叹!这叹息是这样久远、悠长,一千多年来还不断有人应和着,成了许多人的共识。

这种伯乐情结不仅来自韩愈,就连比他更早的大诗人李白,受当时“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说的影响,也一收平日的豪气、傲气,向那位荆州刺史韩朝宗恭敬地表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因为手握大权的韩朝宗是“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这份急切盼望伯乐垂青的心情令人怦然。

李白都如此,何况常人,于是寻伯乐之风,比当年伯乐寻千里马还炽烈。

伯乐的得名,看上去似乎是他的善于相马,其实更得益于世间的千里马稀少。当时盛产马群的冀北之野,也如韩愈所说“无良马也”。这冀北怎么会无良马?细究其原因,却是因为伯乐的一再光临,“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

所以说,千里马的日益稀少,伯乐也有相当的责任,如果他不是“遇其良,辄取之”,在找出了千里马之后,不急于牵去向秦王献礼,而是给以时日培养、发展,冀北之野千里马的繁衍,也就指日可待了!

古今之人一再叹息“伯乐不常有”而忘了其他,这本身就是观念上的误区。

试想:如果当初无千里马于槽枥,伯乐之名从何而起?即便到了今天,如果没有千里马,即便你身揣一打伯乐资格证,也难以树伯乐之名。真正的伯乐决不会指驴为马。

没有伯乐,千里马依然是千里马;离开千里马,伯乐岂能为伯乐?更何况,真正的千里马毋须朝朝暮暮地等待伯乐,天马行空一向是步骤不凡。

慎终追远 传承文脉

岳麓书院纪念孔子诞辰2567周年

本报讯(沈轩)“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在古代传统书院中,祭祀至圣先师是回望先圣、返躬自省、传承文脉的重要方式。今年是孔子诞辰2567周年。9月28日上午,岳麓书院举行祭孔大典。据了解,从2013年起,岳麓书院恢复中断百年的祭祀先圣仪式,每年举行“岳麓书院祭孔大典”。

今年祭孔还是沿用孔庙祭礼中规格最高的“释奠礼”,遵照传统释奠礼要求,祭孔大典进行了迎神、三献礼、读祝、分献礼、祈福受胙、撤馔、送神、望燎等环节。仪式完成后,现场还启动了诵读儒家经典及书院学规活动,全场与会者齐声诵读《大学》等儒家经典篇章以及《岳麓书院学规》,以经典诵读方式向先师圣贤及书院古代教育传统致敬。

“慎终追远、传承文脉”是岳麓书院祭孔大典的宗旨,通过这次活动倡导大家尊师重道,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延伸阅读

三献官:官名。掌祭祀献爵之礼。古代祭祀时献酒三次,即初献爵、亚献爵、终献爵,合称“三献”。

佳句分享:

“人不敬我,是我无才;我不敬人,是我无德;人不容我,是我无能;我不容人,是我无量;人不助我,是我无为;我不助人,是我无善!”——孔子

历史上的今天

1913

年9月29日,中国第一部电影故事片《难夫难妻》在上海新新舞台放映,引起强烈反响。此前中国电影已有10多年的历史,但只是没有情节的动作和戏曲片段。《难夫难妻》以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描述了从媒人撮合开始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的整个过程,因而又名《洞房花烛》。全片共4本,由郑正秋编剧,郑正秋、张石川联合导演,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成立于1909年的亚细亚影戏公司由美国人依什尔主持,是中国最早的电影公司,曾经在香港和上海拍摄电影,1912年开始由张石川、郑正秋等组织新的新民公司承包,《难夫难妻》是承包后的第一部作品。9月29日同时放映的还有该公司拍摄的一部新闻纪录短片《上海战争》,如实记录了“二次革命”时上海围攻制造局和攻占吴淞炮台等情景。



中国首部故事片《难夫难妻》上映

李实